

21世纪初,江泽民同志又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决不意味着取代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不意味着要回到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模式中去。正如江泽民《在四川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所述:“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这就是说,要使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共同发挥各自的功能治理好国家。

认真思考法治的目标和内涵,道德价值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而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法治之所以能成为治国的理想模式,就在于它首先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法律。因而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离。而法制作法的“实然”状态与道德价值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法西斯法律是以屠杀和迫害犹太人以及为纳粹利益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可见没有正确的道德内容支持的“法制”

就称不上“法治”。

与此相联系,道德对法治的发展必然具有重大影响。法治国家的建设,除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之外,还必须要有培育法治精神的道德基础。在法治的发展史上,为法治的建设铺路鸣道的首先是道德观的转变。例如14世纪的文艺复兴形成的人本主义道德观就为近代资产阶级法治的发展奠定了道德基础。

目前,我国是多种道德并存。既有社会主义建设中新兴的社会主义道德,也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从西方学习的优秀道德;既有沉渣泛起的封建道德糟粕,也有外来的资本主义腐朽道德。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冲突和道德失范的现实。加之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多与现代的法治观相背悖,而现实生活中,尽管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作奸犯科”并不因此绝迹,而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常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经济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刘存绪(四川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任何一个时代,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引领,而随着时代发展和条件变化,经济理论也需要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基于前人基础上的一种承续和超越,是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突破。《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一书汇集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有8个专题是直接论述经济建设的,其它专题也与我国经济建设密切相关。这些关于经济建设的集中论述,反映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后,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所提出并阐明的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

社会主义怎么搞经济建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难题。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年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推翻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他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夺取政权,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么进行,也仅仅是勾画出大致的蓝图。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面临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干预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现实威胁,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依靠自己的努力,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后,需要解决的是在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马

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现成答案。邓小平是在社会主义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当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世纪,需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又一次创新和突破。江泽民同志在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环境和国内外条件发生的新变化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科学地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

首先,江泽民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全面系统,涉及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关于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关于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述;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对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关于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论述等等,而这些理论,又集中统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取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成就的强大理论武器。

其次,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理论之所以有效,就在于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性。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来看,理论与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实事求是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自资本主义产生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就应运而生。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历经创立、完善、发展,直接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导致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正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比如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以计算机、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信息革命等为标志的新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搭建了技术平台,在中国进入WTO后,金融、证券、保险业的全球化浪潮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变化的形势

与趋势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积极应对。江泽民同志立足于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最大的实际,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阔视野观察世界和中国,准确判断和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与时俱进的品质。他就中国如何应对世界经济挑战问题上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又是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的新论断。

再次,江泽民同志关于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论述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创新。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计划经济的模式和框架内探讨经济发展的问题,宏观上离不开政府计划和调控,微观方面也有一些条条框框限制,如国有企业产权长期不能市场化、货币化、资本化,对发展民营、私营、外企的种种非难,政府定价与生产、成本等严重背离等等。理论的滞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理论创新的目的是使理论更加符合实际,即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江泽民同志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大胆探索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模式。一方面,在重大的宏观经济理论上有所创造,另一方面,在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也有新的建树。比如以企业改革来说,国有企业离效益最大化的预定的改革目标有相当距离,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江泽民同志从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and 改组国有企业,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切实关心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生活 and 再就业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理

论创新。尤其是在对社会主义发展中不能回避的劳动创造价值问题,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重大创新和突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而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新突破,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怎么界定的问题,以及劳动财富的性质问题;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构成问题;解决了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问题,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

发展、对外开放、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也有新的突破。

事实充分说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宏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在认识和驾驭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解决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发展和人们观念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正确回答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理论创新。这些理论成果,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对于我国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事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程思进(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同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论述,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是全面的、系统的,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一,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就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

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里强调了两种改革“同时”进行的重要性。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关键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看是否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江泽民同志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兴利除弊,要改革不利于党政机关增强活力、提高效率的一切旧体制;要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要扩大民主,下放权力,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种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应当借鉴别国的文明成果。江泽民同志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这个观点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但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文